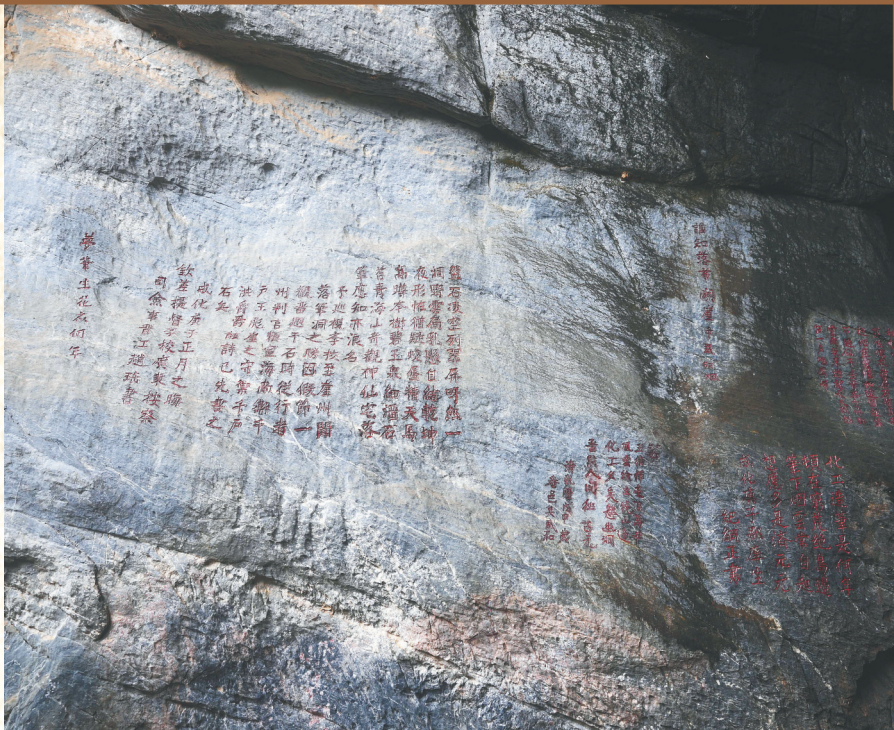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元朝武将云从龙题写的“落笔洞”摩崖石刻。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



落笔洞内的部分宋代和明代摩崖石刻。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

笔砚清玩

画中赏秋

■ 缪士毅

又是一年秋天时。
秋天，是色彩斑斓的季节，也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季节。迷人秋天，最能触发画家创作灵感。于是，历代许多画家用手中的画笔，不惜笔墨尽情描绘秋天，赞美秋天，绘就了一幅幅绚烂多彩的秋天画卷，仅《秋山图》就是历代画家不断重复的秋天画题，如五代画僧巨然、元代画家黄公望、明代画家董其昌、明末清初画家八大山人、近现代画家张大千等，皆绘有《秋山图》，风韵各具，美不胜收。

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，绘画风格各异，但其所绘的《秋山图》却有着共同点，那就是通过描绘《秋山图》给人们带来艺术美的享受，也激起人们对秋天美景的向往。而有的画家对秋天题材情有独钟，一生创作的秋天题材画作甚多，如明代画家董其昌就是其中之一，他绘有《秋山图》《秋山积翠图》《湖山秋色图》《江山秋霁图》《秋景山水图》《江天秋图》《秋兴八景图册》等。

在我国画坛上，像董其昌这样喜欢描绘秋天题材画作的画家还有许许多多，他们描绘的秋天画作，犹如一颗颗璀璨明珠，闪耀在画坛，不仅为秋天增色，也为画坛添彩。

历代画家描绘的以秋天为题材的画作，从描绘的内容来看，有的描绘秋天的山水风光，如近代画家张大千的《巫峡清秋》、现代画家徐悲鸿的《黄山秋色》；有的描绘秋天的丰收果实，如近现代画家齐白石的《秋瓜》、近现代画家李苦禅的《秋味图》；有的描绘秋天的花卉虫草，如清初画家八大山人的《秋花危石图》、清初画家石涛的《秋花疏篁图》、近现代画家齐白石的《枫叶秋蝉》；有的描绘秋天里人们的闲适生活，如元代画家吴镇的《秋江渔隐图》、明代画家沈周的《秋江闲钓图》、明代唐伯虎的《秋林独步图》……这些出自名家笔下的秋天题材画作，其绘画表现形式不论是立轴、手卷，或册页、扇面；无论是设色，还是水墨；不论是纸本，或绢本，皆能从不同视角描绘了秋天的美好景象，流露出对秋天的深深热爱，让人仿佛置身于秋天之中，与迷人的秋天融为一体，以此热爱自然之美，感悟自然之美。

南宋画家赵伯驹的《江山秋色图》手卷，绢本设色，纵56.6厘米，横323.2厘米，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从画面看，此图为首头大卷青绿山水巨作。卷中山重水复，峰峦起伏，树木茂盛，楼观屋宇、山庄茅舍掩映林间，一些旅行者正在道路上行走，似乎陶醉于眼前的美丽秋色，给画面以静中有动、动中有静的感觉。纵观手卷，画风严谨而不刻板，尽显工细之妙。设色浓丽却不俗艳，自然和谐，给人以鲜丽明朗的秋天视角享受。



张大千《巫峡清秋》。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

明代画家董其昌的《秋山图》立轴，绢本设色，纵156厘米，横62.4厘米，现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。从画面看，远近山崖陡峭，起伏连绵，山间树木林立，其中有几株树木叶子被秋风染成了红色，一番秋天景象。几处房舍错落山间，掩映林中，四周云岚隐现，幽清恬静。纵观画面，画作构图层次分明，笔墨技法为折带皴与披麻皴结合，设色轻丽明亮，呈现秋天山色特点。

近现代画家齐白石的《九秋图》，纵31厘米，横157厘米，现收藏于甘肃天水成纪博物馆。从画面看，画中绘有菊花、桂花、秋葵、鸡冠花、木芙蓉、秋海棠等九种秋天应令花卉，蕴含秋天是同庆丰年的季节，因而取名《九秋图》。图中可见一些秋虫或栖息于花间，或飞舞于花上，给画面平添动感。整幅画作洋溢着大自然秋天多姿多彩的景象。齐老所绘的花卉笔墨酣饱，色彩明快。所画的秋虫一丝不苟，极为精细，给人以“色中见笔，笔随色痕”的艺术享受。款识：白石老人画于京华城西铁屋。

近现代画家张大千的《巫峡清秋》立轴，纸本设色，纵92厘米，横47.8厘米，现收藏于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。从画面看，峰峦叠嶂，主峰突兀，云山缥缈，气势雄浑。瀑布倾泻，江流激荡，舟行峡中，劈波斩浪。山峡沿岸树木错落，秋染山林，红叶点彩，别有秋天意境。画面构图丰富，极富层次。画中设色颇具匠心，所用颜色色感亮丽，色彩美艳，给秋景描绘平添几分风采。

文史荟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好山如绣画，野路自委蛇

云从龙与落笔洞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

8月上旬，落笔洞遗址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最新公布的“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名单”，成为海南省首个获此立项的遗址，这标志着该遗址的保护、研究与活化利用工作将迈入全新发展阶段，对于海南考古事业及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
早在2001年，三亚落笔洞遗址便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。最近两年，落笔洞再次成为国内文化热点。2024年12月，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设立“三亚落笔洞遗址联合考古工作站”，启动了新一轮考古发掘。

说到落笔洞，自然绕不开其石壁上“落笔洞”三字的题写者——云从龙，一位元朝将领、渡琼云氏二世祖、时人称之为“三将军”。

史志琼崖

【编者按】

落笔洞位于三亚市区东北方向约15公里处，毗邻三亚学院。洞内的“落笔洞”三字究竟是何人题刻，由于古时落款字迹难以辨识等原因，一度成为学界的一个历史之谜。

方志里的“落笔洞”

海南现存最早的方志、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：“落笔峒，（崖）州东百余里……人其中，有二石形如悬笔，笔尖水滴不断。”落笔洞中两块形如悬笔的奇石，应该是钟乳石，据当地老百姓介绍，这两块钟乳石在1944年时已被日军打断，现在已不复存在。

清代咸丰年间，崖州名士、举人吉大文重评崖州新八景时，落笔洞被列入其中，并美其名曰“落笔凌空”，足见落笔洞在当时当地的影响。

最早将落笔洞摩崖题刻收入方志的是清代光绪年间纂修的《崖州志》，但当时的修志者未能知晓“落笔洞”是何人所题。

答案的出现要到20世纪下半叶的七八十年代，这有赖于存世族谱的出现和专业人士的考据。

摩崖上题“落笔洞”

在落笔洞的左上壁，自右向左阴刻有“落笔洞”三个遒劲的楷体大字，右侧直书“至元癸未”，左边则直书“维山云从龙”。今天看到这些石刻文字，是经过后人的描红处理，才得以清晰可辨，而在明清时期，估计由于海南气候潮湿，南部又属于容易被风化的花岗岩地貌，落笔洞内的不少文字有了不同程度的剥蚀，给前人的考察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障碍。

清末，崖州先贤纂修《崖州志》时，能确认的崖壁上的文字，除了“落笔洞”三个大字，也就是“维山”二字了。

已故海南文史专家王俞春先生，生前曾广泛搜集和研究海南各姓族谱，他曾在文昌的《云氏族谱》里找到了答案。

原来，云从龙，字“无心”，号“维山道人”。于是，王俞春推断——“维山”正是“云从龙”。不过，王俞春的说法一直受到质疑，因为“落笔洞”的题刻者到底是谁，历来就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此后的1984年1月，三亚文物工作者黄怀兴与何擎国等人在落笔洞进行石刻拓片时，发现“落笔洞”三个大字左边的“维山云从龙”五字。

王俞春的族谱考证和黄怀兴等人的现场考察，不约而同地达成了一致的结论，至此也破解了这一争辩多时的历史疑团。

云从龙其人

据查，“至元”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，“至元癸未”为1283年，那么，云从龙题刻的“落笔洞”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了。云从龙是什么人？

方志和族谱的记载显示，云从龙于南宋景定三年（1262年）考取进士功名，曾于咸淳年间任广东钤辖（“钤辖”是宋代重要州郡或军事重镇管兵的官职）；宋代昌化知军邢梦瑛（文昌人）的《节录磨崖碑记》一文，记录了云从龙在南宋末年对鹿回头平寇乱的事迹；南宋灭亡后，解甲归隐的云从龙被元朝重用，至元十六年（1279年）任琼州安抚使，由于扶绥有方，士兵和民众对他心悦诚服；1280年，云从龙调军到崖州（今三亚），此后的安定时期，他醉心于崖州山水，落笔洞自

然也是他游玩的去处之一。

除了题刻“落笔洞”之外，云从龙还赋诗一首：“地极南溟阔，洞天琳宇奇。好山如绣画，野路自委蛇。不见飞仙蛭，空留滴客诗。清风驾羽归，乘此访安期。”然后吩咐随从刻在石壁之上。

据考，落笔洞最早的石刻是落款“宋倭倭才”的一首七律，此后才是署名“宋郡倭倭才”的一首和诗，然后才是云从龙的题名和诗作，明清又有多位官员和文人的赋诗。应该说，落笔洞能够声名远播，主要归功于云从龙的题名和题诗（他可能也是“落笔洞”的命名者），从而吸引了更多的文人墨客接踵而来，逐渐成为崖州的古代名胜之一。

毁誉身后名

先后身处宋元两代的云从龙，由于那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，使得他身后的声名非常尴尬。而他到底是汉族人还是蒙古族人，学术界也是争论不休。

“云从龙一生战功卓著，先后被元朝廷封为‘宣武将军’‘昭勇大将军’‘征南大将军’，人称‘三将军’，地位极其显赫。”王俞春曾经这样评价云从龙，“但由于他一度是宋朝的官员，后来又为元朝效力，因此一直为不服元朝廷统治的海南汉人所诟病。譬如，元代的时候，人们还将云从龙与历代名宦的牌位列在一起，在琼州府学的‘仰止祠’里进行祭祀；到了明代弘治年间，提学宋端仪则以此他



位于海口市西秀镇的云从龙之母、苟太夫人墓（修缮后）。 符能 摄



云从龙墓的墓碑。 陈耿 摄于2012年



清代光绪《云氏族谱》中对云从龙的记载。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 摄

“勤谨和缓”说陈垣

■ 肖伊菲

我国现代史学界不乏大师，其中的“南北二陈”，即南方的陈寅恪（1890—1969）和北方的陈垣（1880—1971）是佼佼者。陈垣曾于1936年初接受北平《世界日报》专访，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他，当时已撰著了一系列可称为开辟鸿蒙的史学名著。

在接受采访时，陈氏话语非常谦逊，且十分简要，令记者大感无所适从，无法从中体察与拈出能令读者大众所瞩目的所谓“看点”与“焦点”来。

当时已年过半百的陈垣，总算是

挪出一点宝贵的治学时间，极其谦虚谨慎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访谈的内容确实不算多，仅在报上连载了三次便戛然而止。这样的情形，与当时同样由该报记者专访并予以报道连载达十一次的沈兼士、十三次的周作人、十五次的顾颉刚等人相比，篇幅上的差距实在悬殊，不免令人感到“微不足道”。

殊不知，这恰恰正是所谓“勤谨和缓”之学者风度与风范所在。他曾谦称“我是书堆里的人”，在治学与态度上，可谓早已洞察并践行“勤谨和缓”的学界代表。

早在1920年，陈垣就对京师图书馆

所藏、由热河运来的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进行研究，当年便撰成《文津阁四库全书统计表》。这是国内首次对《四库全书》的册数与页数所作的精细调查，在当时的学术界实为开创性工作。这一领先于国内学界所做的前期基础工作，也为随后开展的《四库全书》影印工程作了有力铺垫。

之后不久，陈垣又通过对故宫“摘藻堂”的清点查验，发现了倚墙而立的《四库全书荟要》书架和书函。几乎与此同时，故宫中又发现了元代刻本《元典章》。陈垣又迅即着手，将故宫元刻本细加校勘辨析，接续撰成《沈刻元典

章校补》《元典章校补释例》。这两部在校勘学领域有着杰出贡献的著述，皆于1931年完成，后者曾于1932年首发于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外编》，有抽印本行世，两年之后的1934年10月，又交由中央研究院在北平刻印单行本。

从这段陈氏学术生涯来看，可知同时代的中国学者群体中，除却那些勇猛精进的新派知识分子之外，更不乏埋首故纸、扎根书堆者，他们恪守与奉行“勤谨和缓”治学方法，乃是自然而然的风度与风范，是无需公开宣扬与过度诠释的。

学林一叶

